

第  
一  
辑

小概率事件



## 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就是意外，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换算成文人“话语”就要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小至街头邂逅 大至晴天霹雳。

我今天的恶业，就开始于一个意外。1982年春天 我最后一次考研究生 不幸在车厢里遇到一个窃贼。那时他已经得手 将我上衣口袋里的一个信封扒窃过去，而我丝毫没有知觉。他打开信封一看 却无分文 仅一张准考证而已。他也可以悄然下车 将那薄纸一揉一扔。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冒着被我喊一声“捉贼”的风险 将信封掷还给我 还不失幽默地提醒一句：“老哥 看看丢啥不丢？”这一奇遇造成我生活的转折，一直延伸到现在。以后也不断遇窃 有一次甚至偷到住室里 但再也没有碰上一次这样的古风义贼。我爱读龚自珍 此后读到“左无才相 右无才史 抑巷无才偷 藪泽无才盗”就有共鸣 只是觉得老先生亢奋 还有点少见多怪。

那时还剩有最后一点野气，习惯于爬货车旅游。有一次带着夫人和我弟弟爬一列货车去西安，一路奇遇不断，甚至碰上地震。最为奇怪的场面 是在豫陕交界的一个鸡毛小站 火车突然停下不走了 说是前面出了事故。好几列火车就在我们身边快快停下 其中还有直达快车“74次”。那一趟车从上海出来 开到当地算是天之骄子 通常对这样的鸡毛小站是不屑一顾 呼啸而过。这一次它算是屈尊光顾 但是所有的门窗都紧闭 惟有车厢内灯火通明 傲

对穷山沟的苍凉暮色。看看天色将晚 前不巴村后不巴店 我们只能跳下货车 就沿着这一溜灯光的下面走 想碰碰运气。走啊走，快走完了 运气也终于来了 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窗内大声叫喊我弟弟的名字，一边喊，一边打开车窗 把我们一个个接了上去。原来是我弟弟小时候的同学 但早已不同校 很早就转学到了另一个学校。那一次他是从上海到西安去探望父母 往车下张望一眼，竟然就看到了一个分别多年的小学二年级同学在陌生山沟里转悠。那男孩张嘴就喊 冒叫一声 居然就没有半点搞错。多么可爱的童言无忌！

陇海线边有一个兰考 兰考有一个县委第二招待所 我们那时习惯叫“二所”。看电影《焦裕禄》 就发现很多镜头是在这个院子里拍的。比如焦裕禄的家 焦裕禄决定“犯一次错误”与武装部长灯下聚首 商议去登封县采购粮食来救活濒临饿死的下属 还有李仁堂装模作样地扮演地委书记从开封来查办此事 到达县委大院，从那辆老式小卧车下来 派头十足地一甩车门 作清官愤怒状 都是在这个又破又脏的“二所”拍得。但在当时 知青到县城办事 偶尔耽误一晚 能住上“二所”也不管有没有虱子 钻进被子就睡 已经是县委知青办给我们的奢侈礼遇了。那年冬天，我的一个少年伙伴自费坐火车来看望我 正碰上大雪天 不能往乡下赶路 只能到“二所”暂住一晚。那时没有独住的概念 很自然就安排我们与另一个人同住一间。两个儿时伙伴多年不见 又值年轻气盛，一夜说个没完。我们还留有一点自觉，为了不影晌那个同住一室的邻人 尽可能用家乡土语压低声音说 想着他不可能听懂 也就不影响他入眠。不料第二天起来 那位老者把脸一抹 哈哈一笑 然后用倚里倚气的兰考话对我们俩说：“你们说了一夜 我也听了一夜，你们的家乡话 我全听懂了！”他拍拍那条空荡荡的裤腿 又接着说：“我这条腿 就是四一年反扫荡 丢在你们家乡的。我在那打了三年游击 你们那几句南方土话还听不懂吗？两个人面面相觑 恨

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昨夜风雪弥漫 既谈革命理想 又谈小资产阶级私人话语，还发了一些在当时十分反动的对时局不满的牢骚，全让这个一条腿丢在三千里外的老汉听去了。呵，他也是一个雅各，只是一条腿丢在赫尔岑视野之外。

类似的奇遇去年在纽约又碰到一次。几个老朋友请我去一个饭店餐叙 席间谈起上海“文革”初期的经济主义妖风和一月革命。我予前者以正面评价，称后者为全能极权政治对市民利益觉醒的又一次扑灭 几个人就争论起来 我说：“这件事要是上海的某某某在场 就能说得清楚 他是当事人 而且了解内情 可惜——”正说着 这个某某某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了 这是在纽约东城 不是在兰考“二所” 隔着上下三十年 还有一个太平洋 时空两端皆相遇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还是个“后现代美国曹操” 概率之低 只能说是千万分之一 甚至是亿万分之一。他却拉开一把椅子 在纽约我的对面大大咧咧坐下 就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 看得我眼睛都直了，半天都回不过神来。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在一段时期内 人的运气不能太好。否则 另一种概率就会在负极聚集 生成一些负面事件，一报还一报。那次美国之行 我不止一次碰到好运 结果乐极生悲 留下了一个终身遗憾。

我小时候常常等在弄堂口，等着那个以后到兰考来会我的小伙伴，回来讲他中学里有个叫刘海生的语文教师，如何剑胆琴心，思想深刻，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两个细节或者小故事。那又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季节 随便一颗种籽落在少年人干涸心田里 都会发酵疯长。久而久之，在我的热切想象中，刘海生就被放大为一个“会弹钢琴的十二月党人”。而我成年后反省 发现自己有一面是旁听着刘海生故事长大的 居然从未谋面。199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我在上海外滩 55 路公共汽车里旁听到一段对话，一个乘客对另一个乘客说 她的中学老师责怪她不能将《顾准文集》这样的书只看一遍。当时车厢里没有灯，黑暗中鬼使神差，我竟然上去插

话，而且一语猜中，那个中学教师就是我想念了二十多年的刘海生！这个小概率事件使我兴奋不已，回来写了一篇短文《缆绳岸》发在《新民晚报》上，大意是说生活里有一种像缆绳一样的东西，多年前飘过来，再打个结飘送过去，按概率它走不了那么远，早就应该寸断，居然就磨不断，一寸一寸地蜿蜒，几十年内走了一个来回。刘海生当时已经是沉疴不起，在病床上读到这篇文章，打电话来问，这样就有了联系。他很希望我能去谈一谈，大概想看看一个素昧平生的旁听生是个什么模样。我那时出国行期在即，有些忙乱，更顾忌去他病床边看望的人已经太多，不好意思添乱，于是双方在电话里长谈了一个多小时，约定我从美国归来，再好好地见一面。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说起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他们居然是刘海生的正宗学生，至今还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于是那三天就多了一个话题，不断讲刘海生的故事，他的险峻出身，他的“文革”遭遇与不屈，还分析刘海生这样的理想型人格在大陆这个环境为何罕见，以及他如果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一定浮想联翩，等等。三个人把一个世界越说越小，似乎这世界的知音不必灰心，或迟或早，上帝总会安排机会，让他们碰到一起。其实是因为太少，就这么几个人，很容易相互知道。反过来一看，也是因为少，动如参商，更可能缘吝一面，终生遗憾。几个月后，我回到上海，行囊未解，就接到一封镶着黑边的小信封。打开一看，刘海生因病去世的讣告赫然在目！

我颓然无语，只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这已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生不得见死方见。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会有这么多人来与他告别。人群沉默着，排着队，一直站到大厅外面。吊唁者中，我还认出几个经常见面的熟人，此前却谁也没有想起来说一声，我们原来有一个共同的师友，有一个本来可以相通的

枢纽 按照他的生前爱好 那天没有放通常的哀乐 而是播放他喜欢的一首钢琴曲——萧邦《葬礼曲》。财经大学的刘新是我的同代人 此时代表海内外所有学生致悼词 那已经有好几代人了。刘新最后一句泣不成声 向刘海生遗像深鞠一躬：“老师，下课了……”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海生夫人赵佩秋先生，她拉着我的手，泪下如雨：“缆绳断了 缆绳断了……”我知道是我不好 竟然是在老师最后一次“下课”才得见先生一面。到临了 我还是一个不肖弟子，一个不入册的旁听生！

我到现在也拿不准这些小概率事件的意义。人们通常埋首于日常生活的川流不息，不太欢迎小概率事件突然来袭。是让人在琐事中逐渐平静，以免一惊一咋，还是来一点冲击甚至突然一击，身心一震？当然也不能高估小概率的作用。即使一箭袭来，只是转瞬即逝，确实也难撕开那么厚重的尘埃。但它们毕竟有过一二，也就证明这生活恐怕是会有一些意外。

这世界还有意外？那也就值得等待。

## 访美五题

“你必须离开”

以前我去美国，都是开会，匆匆而过。前年抵哈佛做访问学者，一屁股住了下来 锅碗瓢勺都要置办 还要租房子 这就开始闹笑话。

新英格兰地区通常的房子是地面以上木结构，地面以下才是石结构 这样的房子很怕着火 故而当地人养成对火警特别敏感的习惯，几乎每一室都有烟火报警器。哈佛燕京学社租给我们的房子已经够好了 是在哈佛警察局的楼上 整幢楼都是砖石结构。那种砖头比国内常见的结实许多 呈暗棕色 敲上去有钢音 钥匙都刮不出痕。大概烧制温度特别高 按照前《历史研究》主编我们的江苏老乡庞朴先生戏言“都快烧成琉璃了”。但就在这样的大楼里 每一间也都有那讨厌的东西 而且在每一层走廊里还加有一个音量更大的。

庞先生比我早到一段日子。他告诉我说 我去以前 报警器在大楼里已经响过四次 因为中国人好用油锅炒菜 那玩意稍微多闻一点油烟就响 叫我做饭时小心。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 那玩意就响了 而且震动了走廊里的那只大家伙“呜啊 呜啊”特别恐怖 就像电影里希特勒狼窝遭炸弹袭击那样响法，毛骨悚然。起警的原因是隔壁那家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博士生，他夫人出门时把一锅中国稀饭放在电炉上 却忘了拔电源 那位博士生恰好姓“焦”。

焦先生房间里不断飘出中国饭的焦糊味，很快刺激起报警器，大放悲声，一眨眼工夫，坎布里奇市仅有的四辆消防车就把警察局这幢大楼包围了。

我那会儿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一听起警，披起睡衣就去敲邻居的大门，一间间地敲，用中国话喊：“救火啊，救火啊！”但是就跟消防车来得一样快，眨眼工夫，全楼人都跑光了。我奔到庞先生门口，拼命敲门，也是没人回应。心里就不免嘀咕：怎么中国人就这么自私呢？这时，消防人员冲上来了，用太平斧劈焦先生的房门。一个警官模样的人发现我在走廊里，就像发现星外来客一样惊奇，大声说：“你怎么在这里，你必须离开！”我还想磨蹭，那口美国英语立刻打断我，变得比火警还要粗暴：“No! No! You must leave!”就跟吆喝一个罪犯一样。他暴跳如雷，还挥手示意正从楼梯间冲出来的一群警员，要把我这个奇怪的穿睡袍的东方人拖出去。

我只得快快下楼，在路边看见了一大堆熟悉的中国学者，穿什么衣服的都有，包括庞先生。我正想发表中国人如何自私这类文化感慨，庞先生破涕为笑：“你这个呆子，我在楼下找你，急得不行，你还在楼上要救火，你去看看你门背后挂着的牌子，那上面写着什么！”

火警很快解除了。我随众人上楼，这才发现每一间房门后面果然有一个牌子，上面用英语写着同样的话，大意为：

亲爱的房客，如果发生火警，你必须迅速离开，不要抢救火，不要救你的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落款是：“坎布里奇警察局”。

## 从“五月花”到“哈佛”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即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飘》的家乡，长驱 3000 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国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近距离看美国》和《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为中国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妇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1997 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第一个地方是普利茅斯，离哈佛一个多小时车程。那是英国移民到北美登陆的最早口岸，有“圣地”之称。我们去的那天是阴天，彤云密布，景色萧瑟。惟见远处一条大帆船停泊在海岸，五颜六色，显得特别鲜艳。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却是后人仿制的。

那条真实的“五月花”号早就烂完了。它是在 1620 年 11 月 11 日一个寒冷的日子抵达这里的，从船上摇摇晃晃走下 102 个清教徒移民，衣衫褴褛，形销骨立。他们原来的目的地是弗吉尼亚，风浪将他们吹到了这里，只能改变计划，落地为安，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他们当时是踏着一块海边岩石上岸的，那块岩石大约一米见方，经 337 年的海潮冲刷，还在原处，一半在海里，一半露出水面。美国人称它为“普利茅斯圣岩”，在它露出水面的那一

侧刻了“1660”四个阿拉伯数字 迹近神秘 几乎朝拜它为整个北美文明的发祥物。岸上有一个回廊，好让参观者在它的上方来回走动 以仔细端详这一伟大的“圣岩”。

那批移民自说自话改变了出资组织这次航行的公司定下的目的地，以后的事情自然只能靠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了。全体移民签定了一份公约 自己约法三章 有点像我们 70 年代的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地下民约。史载《五月花号公约》全文如下：

我们这些签名者，为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和我们君主与国家之荣誉，已决心远航弗吉尼亚北部，去开垦第一个殖民地。兹由在场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庄严地互定契约，把我们自己联合为一个公民团体，以便更好地实施、维护和推进上述计划；并根据公认为最适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则，随时随地出于至诚地制定、设立和构造出如此正义和公正的法律、条例、措施、组织和机构。我们约定 所有的人都应当服从与遵守这一切。作为证人，我们签名如下。

（签名从略）

当时他们从英国来此 要航行 5000 公里 在海上颠簸 4 个月，还未抵岸就有人耐不住风浪折磨而死去，第一批幸运上岸者 102 人，上岸不久 即逢严寒来临 第一个冬天又冻死三分之一的人 以后的几个冬天 不断有人死去。就是这样一群奄奄一息的人 居然还有心情一字一板地签定那样一个公约，从此奠定北美 13 个殖民地的自治原则，这一原则后来又融进了现代宪政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力界限 其历史作用一点不亚于后来的《独立宣言》。后者只是宣布了与英国决裂 规定了 13 州殖民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而《五月花号公约》则奠定了 13 州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规则。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五月花号公约》 就不会有后来的北美文

明。19世纪吸引一代又一代欧洲人到这里移民的，第一是这里辽阔的土地 第二就是辽阔土地上的自治原则 土地加自治 以及由此形成的机会均等 这就是后来与‘普鲁士道路’相对应的北美现代化模式——“美国道路”。而这条美国道路 就是从那块‘普利茅斯圣岩’开始的。

还有更为令人惊异的。

我的两个小贩朋友嗜好阅读游览地各种铜牌上镌刻的纪念文字 离开‘五月花号’不远 他们就发现了一块与哈佛大学历史有关的铜牌 文字大意为：

有一个叫‘哈佛’的传教士 登陆不久就开始操心精神播种问题 他说 我们接受了欧洲的文化 但是这里谋生太艰难，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很有可能在开辟草莽中遗忘了欧洲的文化，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为了避免这一荒蛮，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节衣缩食 办一所大学 让我们的后代从欧洲教育的终点开始。这个叫作‘哈佛’的人捐出了他的藏书、财产 这就是1636年哈佛大学的起源。

哈佛离这里有多远？从空间上说，60英里开外 从时间上说，离初民在这里登陆仅仅16年 离美国独立建国还有140年。在那16年里，几乎每年冬天都有人在普利茅斯的海边冻饿而死。按照中国儒教有关物质充盈与教育起步的先后次序，仓廩足，知荣辱，知荣辱 民可教 这些‘五月花’号上下来的初民却反过来了 仓廩不足人冻馁 荣辱未开民已教 他们怎么会 在饥寒交迫奄奄一息时 不想到发财致富 至少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是想起来要办一所劳什子大学 而且说干就干 从捐出自己的藏书开始 此前我在哈佛参加过那里的校庆 看到一幅标语说：“未有美国 先有哈佛！”当时有所不解 还嫌他们太狂妄 今天身临普利茅斯的荒凉海

滩 眼前一亮 豁然开朗 这才有所领悟。再回想哈佛校园里 还有一尊哈佛坐姿铜像 老哈佛坐在那里 一坐就是 260 年。谁知道那尊铜像是 1736 年校庆 100 周年浇铸的，并不是哈佛本人，而是 1736 年的一个普通学生！真实的哈佛先生已经无踪影可寻但又必须给这个最初的创办者立一个铜像，于是哈佛的后代们就在活着的学生挑出一个 认定哈佛就是像他 而不是他像哈佛 于是又自说自话 按那个学生的五官长相及身材 浇铸了那尊铜像。美国人的天真与幽默在这里毕现无遗 既有自我作古 拿不到 300 年的历史处处显摆，又有顽童般的嬉戏，经常消解自我历史中的神圣。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动辄美化先贤 相反 在中国人认为很严肃要把脸板起来的地方，会突然来一个出人意料的幽默，甚至恶作剧，一下子松弛下来。但是，“假”哈佛并不妨碍“真”哈佛应该得到的敬意。260 年过去了 那个“假”哈佛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领受着世界各地游客仰视的目光。一双铜靴被每年秋季开学的上万名各国新生摸来摸去，260 年摸下来，那还了得？自然是油光锃亮！260 多年过去了，那个校园里的人几乎年年要喊“未有美国，先有哈佛”、“未有美国 先有哈佛”牛气冲天 白宫和国会山只能自认晦气 总统俯首 美国低头 拿哈佛无可奈何。这就是哈佛 哈佛的精神财富！

中国人是会做生意的。即使在普利茅斯这样游人罕至的地方 也不难找到我同胞开设的餐馆 而且很大 有几十张桌面。我和佐治亚来的两个小贩在这里坐定，还能点到三罐从中国进口的正宗青岛啤酒 只是菜已经很不正宗了 味同嚼蜡。今天反正不读书 我们就在那里议论起这家餐馆的招牌 不知是什么意思：“Ming Dynasty”，“明代”？“明朝”？“明皇朝” 是因为这家老板姓朱 还是因为老板来自明代立国之都南京？抑或别无深意，只是一个简单的纪年——以此提醒普利茅斯的游客 当“五月花”号靠岸的时候 当“哈佛”第一次动议捐办的时候 中国那时以“皇家”纪年 当

时叫做“明代”。

### 隐入草地的纪念碑

我不喜欢美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纽约，几乎是上海的急剧放大 加倍地繁华 也加倍地嘈杂 到下个世纪上海大概是能赶上。但是我喜欢那些城市中的绿地，无遮无拦，随时能入内休憩。在那样的草地上 看不到官养的白鸽 按时起落 以点缀广场的天空 却有小松鼠野生野长，一蹦一跳 就在你脚下嬉戏。这样的街头情趣，上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现了。

以前读过刘亚洲的一篇报告文学，就像北京城里大多数人说话 首先是口气大 北京之外 全是他部下。只记得那篇文章是说在天安门前漫步 称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为北京人能拿出这样大的一块地皮作广场而自豪。后来我去华盛顿，发现此言不确。中国人大概只习惯把一大块空旷的裸地称为广场了，似乎广场是供人们进行政治集会的地方 而草地只不过是一片小家碧玉 仅供人站在绳栏外观赏。华盛顿纪念碑下的那块绿地，周围有国会山、白宫、林肯纪念堂 也具有政治功能。60年代社会动荡 它就常被激动的示威人群占领 中国的电影观众可能在《阿甘正传》中见过那时国会山下学生反战集会的浩大场面。只是难以想象广场在大多数时候是平静的，而且是青青绿草，随时随地可以坐下来休憩。示威者一旦撤离，脚下露出那片绿地，大概是天安门广场的两倍，上海人民广场的六倍 其间喷泉淋水 情侣依偎 还有无数松鼠出没。

真正小的不是广场 而是白宫。白宫之小 倒真超过中国人的想象。也许是行政权低于立法权的象征？它是广场周围最为矮小的一幢建筑 两层楼的白色小楼 小得可怜 恰与远处国会山之巍峨雄壮成反照。后来我回上海作过比较 城里的不说了 即以郊区

十座县城而论，座座县城的衙门都比白宫大。

华盛顿广场最成功的建筑当数越战纪念碑。我在上海时已不止一次看过它的照片，但身临现场还是感到震撼。令人震撼的不是它的高度，恰恰相反，它打破了以往纪念碑以高度取胜的常规。准确地说，它仅仅是一堵低矮的长墙，起始处稍高出两米，然后以缓慢的坡度逐渐低落下去，末端隐入远方的草地，渐趋消失。

它与其说是一座纪念碑，不如说是众平民发一声喊，把一座虚拟的纪念碑推倒，就让它如长龙横卧，永远作反战控诉。它的墙面是黑色大理石，以统一的印刷体字母镌刻着全体越战死亡军人的姓名，从将军到士兵，不分军阶，以出生年代分区隔，再以姓氏第一字母为顺序。在纪念墙开始的这一端，隔着一块草地，先是一座越战老兵铜塑像，三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其中一位还是黑人，似乎刚从越南丛林中跋涉而出，精疲力尽，猛然看到远处有一堵死难战友的长墙，以及长墙下游走的鲜活人群，一时惊愕，随后即露出一片悲伤，那片悲伤就永远冻结在那尊铜像上。顺着他们的目光往前走，跨过那片草地，走近纪念墙，顺着墙走，走过成千上万死难者，墙越来越低，逐渐没入草地，最后一排士兵的姓名消失在草根深处，就在这里，一抬头，正好接上华盛顿纪念碑迎面矗立，高耸入云，倘若这时有中国人，见如此反差映照，会不会想到他们幼时即耳熟能详的唐代诗句呢？——“一将功成万骨枯”。

到这种时候，你可能还会明白中国的汉字与西文字母的另一差别。汉字的象形特征成全了一门叫做“书法”的艺术，西方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仅仅是把字写好就能成为艺术家，而且是以字计价，日进斗金？每到有纪念性建筑落成，往往是中国文人和政要弄弄他们书法的机会。凡是有纪念碑的地方，首先吸引人的是纪念碑上的书法与落款，而真正应该纪念的死者姓名，却被那些龙飞凤舞的镏金字迹掩盖。西文由拼音字母构成，太乏味，留不下让文人构思起落间架的余地。每到这种时候，他们很尴尬，拿得出手的只有

千篇一律的印刷体。不料这样一来 死者幸运 反倒有助于凸现谁是被纪念的主体。记得在夏威夷珍珠港参观，美国人在当年被日机炸沉的巨舰亚历桑那号残骸上建起一座水上纪念馆。亚历桑那号的万吨残骸沉卧在清澈的海水下 历历可见 纪念馆为一白色棺材造型 就架在残骸之上 垂直交叠 成海面上一巨大十字架。参观者先在此岸免费看纪录片 后由水兵引导 坐海军渡船去对岸瞻仰纪念馆。下船上栈桥 脚下经过亚历桑那号 底下钢铁残躯还有当年残剩的油迹一缕一缕漾出，在海面上流淌，似冤魂 50 年都未流尽。而长方型棺材纪念馆内则什么都没有 耐心走到底 到底一面墙，墙上无任何说明文字，只有印刷体排列着的 2280 人姓名。一看即知 这是珍珠港事件美军全体死难者 按中国人的说法 叫做‘以姓氏笔划为序’。偌大军港 此岸彼岸 又是电影 又是海上十字架 走到头 就让 2280 个死难者姓名排印在室内一面墙上，戛然而止，再无一言。谁能想到美帝国主义还有这一手？单调的白墙 单调的印刷体 兜头劈面 黑压压一片 中国人在这种场合的心理期待 是要看到某文人某政要的镏金题词的，一看没有 就可能嘀咕‘乘兴而来 败兴而去’。然而仔细一想 还有什么比死者本身更值得凸现 只有这样 才能直逼生命尊严 才能唤起活人对死者的敬重。我也是到那一刻才顿悟 在这种地方 死者因轰然一响而扯平 进入永恒平等 如有等差 只能表现于一点已逝者比苟活者尊贵 比文人尊贵 比政要尊贵 书法再美 也不能到他们的头上来卖弄。珍珠港是这样，华盛顿广场越战纪念墙也是这样。即以后者而论，数百米死亡之墙能刻上多少死难者姓氏？5 万人以上。

活着的人到那堵墙下表达他们的哀思，常见的是鲜花。但在那一天 我还看见有另一些东西。有老军人坐轮椅而来 只在昔日战友的名下放上一罐啤酒和一对旧军靴 相对茫然 有妻子在亡夫名下摆着一封信 信口封着 无谁触动 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寻找到一个死者的姓名 正在用铅笔白纸临拓那组印刷字母 也没有人打

搅他们。人慢慢走动起来，还会领悟到设计者在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中，为何独重黑一色的大理石。那黑色的石头是有灵性的，它能反光，蓝天白云，芳草碧地，还有川流不息的行人，都被它收摄于内。黑色长墙如黑色镜廊，活着的人在流动，叠映在死者的姓名行列里，这就是生与死的对话。

### 另一种记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国家大了，什么人都有，其中最大的差异恐怕就是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异。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1996年初夏，我第一次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那里正在举办奥运会，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注视着这个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后来这个城因为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接待规格不如国内习惯的那样高，以及另一些中国人不太习惯的问题，曾激起一部分留学生的愤怒。对于这些遥远的爱国主义——出国之后再爱国，我以后若有机会，会在这个栏目写一点不同看法，可能会让这些爱国同胞生气，甚至挥拳相向，有什么麻烦，到那时再说。这里先说当时亚特兰大留给我的印象。

这个城市不大，但似乎架子不小，它的居民不太欢迎在家门口举办奥运会，确实没有我们中国城市那样每到这个时候像孩子过年那样兴奋。我所生活的上海，比它大十倍，却比它更年轻，更容易被感动。不要说举办奥运会，就是举办一届本国的运动会，开幕那一天，全市职工也要尽可能放假，并停留家中，为的是让出尽可能多的车道，保证那几个踢球的健儿能准时进入某个特定的体育场，而全城所有的扩音设备这时都会尽可能打开，从电视机、收音机，直到楼底下居委会老妈妈的铁皮小喇叭，都要反复通知，要居民收听开幕式那激动人心的实况。亚特兰大的居民不知从哪儿来的那种架子，来这么多奥运健儿居然不待见，盛世大典还未开幕，